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我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 1976 年底。《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斗。我正好在初中的美术组里，绘制过一幅漫画，把“四人帮”扫进从巴枯宁、考茨基到希特勒、东条英机、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的“历史垃圾堆”。30 多年后，2007 年 3 月，我去奥克兰的 Niebyl-Proctor 马克思图书馆参加由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哲学的社会主义者 Ann Robertson 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哲学”的座谈会，又是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进行批判。不过，我没想到约二十人的与会者中，有半数接近安那祺主义的人士，结果变成对 Robertson 教授的帮助会。她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再学习。我一方面记得在东京时松散的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亚洲安那祺主义联盟）精神，终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同时对于从哲学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没有留意过，在会上没有谈哲学问题。会后读了一遍 Robertson 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注 1），可惜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似乎马克思与巴枯宁在哲学上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冲突”，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唯一的哲学思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学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都曾热衷于辩证法。不过，巴枯宁不是理论家，总是强调马克思的知识渊博（特别在经济分析方面），要向马克思学习，计划把《资本论》译为俄文。马克思也以起码的学者风范，把《资本论》献给他的对手：巴枯宁。

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职业，自然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从未掩饰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新兴强权的崇拜和倾慕。马克思后期虽然在英国生活二、三十年，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期间只限于德国。即使在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最大领袖拉萨尔也是马克思的对手，只是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德国工人运动被李卜克西和贝贝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才接受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被列宁咒骂为“叛徒”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巴枯宁由于参加德累斯顿的起义被普鲁士政权判刑并被遣送回沙皇俄国的监狱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抱幻想（注 2），也不认为自己或马克思那样的“先知”可以改造国家。相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巴枯宁更接近于法兰西共和或瑞士联邦那样的自由联合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隶制。”

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巴枯宁（与蒲鲁东）则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残余，革命者的职责不是领导，而是帮助、鼓动被压迫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自我解放了的民众自己知道如何

组织社会生活。马克思则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后，再让“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消亡”；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必须要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攻击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作对，马克思所关注的是较狭隘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巴枯宁设想的是广义的改造人类组织方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既然近代国家必须由少数人集团执政，在国家常备正规军被外敌侵略军击败的千载难逢的政治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不会同意）能够以一党专制在俄国和中国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民众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凯旋，柏克曼哀叹：“社会主义靠出卖自己征服了世界。”“专制，不管白色红色，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强制、压迫和悲惨。这就是其特征和本质，不会是别的。”（注3）。

不过，如果我们略为客观地考察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实际过程，发现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并不具有被各自的追随者夸张的意义（注4）。他们都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得到激励确立了各自的世界观，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激动（注5），又尝尽失败、流亡或流放命运的苦难，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任何可能的领袖资源。应该说，马克思是个天才思想家，在思想上独断尚无大害，巴枯宁是个实干组织大师，玩弄一些秘密手段也很难避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经营“国际”（注6），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欧洲社会主义势力，与尚未丰满的欧洲资产阶级决一雌雄。但马克思容不得安那祺主义者争夺领导权，证实了巴枯宁“权力腐化任何人”的信条。马克思主张组织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以自治协会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制。正如巴枯宁1868年在和平自由同盟大会上明确声明的那样：“我讨厌共产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由。我不能接受没有自由的人类。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所有社会权力集中和吸收到国家，它一定会最终把财产集中到国家手中。相反，我要废除国家，要激进地消灭权威的原则和国家的监护。”（注7）最后，在马克思把持下的“国际”总委员会（执行局）把1872年的总会定在海牙，目的就是为了让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容易从英国、德国和法国出席会议，而安那祺主义势力较强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不易派代表出席。实际上，巴枯宁本人如果从瑞士出发，在路经法国或德国时就会被逮捕，而受巴枯宁影响最深的意大利代表团就因为抗议这种安排而抗拒出席，并干脆退出了“国际”。在最终出席会议的65名代表中，来自德国的19名与总委员会的21名就构成了大多数，只剩下25名不为马克思控制的代表为不能与会的巴枯宁辩护（注8）。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亲自与会的唯一一次“国际”的总会。这次总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巴枯宁及其追随

的安那祺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深知无法继续控制“国际”的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移到美国，以图摆脱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其恶果不仅是分裂了“国际”，而且葬送了“国际”本身。

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争夺领导权的个人恩怨中，马克思用尽手段诋毁巴枯宁，包括暗示巴枯宁是沙皇间谍等；巴枯宁则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原则性。当他的追随者们催促他反击马克思时，巴枯宁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宁愿“被屠宰”而不去“屠宰”别人，颇有“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大丈夫胸怀。相对于马克思蔑视斯拉夫人种和西班牙语世界的倾向，作为俄国人的巴枯宁对于“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赋予比“先进发达”的德国工人或犹太市民阶层更大的同情和期待。这实际上也是自此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与安那祺主义者冲突的一大特征：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包括掌握国家权力的列宁主义者）为了狭隘的政治目的（归纳为国家权力）从一切领域攻击安那祺主义并直接镇压安那祺主义者；而安那祺主义者总是低姿态地维护、理解并忍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谩骂、攻击和镇压。当然，安那祺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判断上也犯下过错。最可悲的例子是克鲁包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流亡太久、年事已高，远离俄国的现实，拼命坚持俄国要继续与“自由的”英、美同盟（注 9），与“专制的”德国作战到底，客观上帮助布尔什维克抓住民心，夺取政权并轻易地镇压安那祺主义者。

可以说，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注 10），但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也需要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我理解并体会在这个社会、政治条件丰富、复杂的世界里，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性格权威的马克思，对于不少受压抑的阶层，不失为精神上的解救，如果没有“国家主义”的缺点（绝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尝到腐败的国家权力的滋味），马克思主义也是引导不少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入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这些有幸经历了各种思想、现实考验的人深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定会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安那祺主义（注 11），我们也完全理解那些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毛主义”等称号的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称号不仅是不重要的，还常常是无关本质的，甚至是误导人心的（注 12）。另一方面，有许多以自由的方式追求公平、人道的社会变革的人士虽然不知道、不愿意“安那祺主义”的名称，但他们的行动比“马克思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今天，正如在世界社会论坛那样，那些以不同的口号、旗帜抗议所有国家腐败权力的世界各地的民众，已经克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国际”的冲突，联合到解救地球文明的共同道路上来了。

本来，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一党专制的中国现代奴隶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的践踏。除了十几年来至今不能回到中国，我又怎能忘记自己 1995 年不得不逃离“社会主义者”四十年后好不容易登上总理宝座的日本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出卖、滥用，连“消亡国家”、“废除边界”、“废除常备军”、“全民就业”、“各尽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国际”的基本原则都被遗弃的今天，安那祺主义更能号召全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会主义精神。

[注 1]Ann Roberts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Marx vs Bakunin Conflic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2003 issue of *WahtNext?*

[注 2]巴枯宁 1850 年在监狱中曾经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过 96 页长的“悔过书”，成为马克思等对手攻击的把柄。这很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各种蒙混过关的“自我检查”，其中有对沙皇的恭维表忠，但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十年来在德国等欧洲的经历，试图说服沙皇改革。例如：“当您旅行世界各地，会遇到各种罪恶、压迫和不公，在俄国状况更糟。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民众比西欧人劣等；相反，我认为我们俄罗斯人比西方人更好、更亲切、更具有宽大的胸怀。问题在于西方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抵制罪恶：公共性、公共舆论和自由，这使人高尚和自尊，而俄罗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的语气，非俄罗斯人不能理解，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追究在监狱里写的这类材料。见 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47。

[注 3]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xiii and p.136. Paris, 1928. Reprinted by AK Press, Oakland, 2003.

[注 4]我目前订阅的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经常评述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世界里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包括古巴，甚至委内瑞拉）的霸道行为，并追踪到当年马克思分裂“国际”的“原罪”。

[注 5]列宁主义者喜欢解说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俄国的“契卡”那样的超越法规的秘密警察）。其实，在公社成员中有不少巴贝夫和布朗基的追随者，相当于巴黎公社的“先锋队”。正如巴枯宁指出的，巴黎以外的整个法国地方都没有起义或抵抗普鲁士军队，巴黎公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英雄悲剧史诗。

[注 6] 后来有所谓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四（托洛茨基）国际继承“国际”而把“国际”称为“第一国际”，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国家社会主义的变种，已经抛弃了“国际”的部分基本原则。

[注 7]引自 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01. 原文引自法文 1868 年 9 月 23 日。

[注 8]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266-267.

[注 9]克鲁包特金作为一个科学家（地质学和社会学），获得英美知识界主流的承认（如两次获邀到美国讲学），被誉为“最高贵的安那祺主义王子”。后来，他回到布尔什维克专政下的俄国。

列宁为了利用他的国际名声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对他象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优遇。见 George Woodcock, “The Anarchist Prince: Peter Kropotki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其实，他对英美战争政策的错误判断，由他最出色的学生古尔德曼和柏克曼早就指出了，但他听不进去。见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注 10]以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很难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些很教条的组织，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依然在固守马克思的教义，但它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影响。见笔者的介绍：“我看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发表于香港《先驱》1996年5月）<http://cpri.tripod.com/cpr9697/iso.html>，“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印象”<http://cpri.tripod.com/cpr1999/slparticle.html>等。

[注 11]美国社会主义老战士 Bookchin 是一个很好的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向安那祺主义转变的典型例子。他 30 年代大萧条时 9 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不断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论战，被现实转化。他甚至断言，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二战以后，也会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见 Murray Bookchin, “Anarch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ft,” AK Press, Oakland, 1999. 同时，我们知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曾经是安那祺主义者。瞿秋白在临死前承认他还信仰国家的消亡，但对为什么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这个理想感到怀疑，由此否定自己的政治生涯。

[注 12]希特勒的“纳粹”national socialism 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潮流之一的共产党攻击其“兄弟”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用语。安那祺主义者本身也有不少称号，克鲁包特金称自己为“共产安那祺主义者”，强调经济（特别是分配）制度上平等；巴枯宁则厌恶“共产主义”这个词，因为这联想到政治上的强制，他更宁愿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个用语。按照杜尔凯姆的研究，共产主义本来是古希腊概念，远早于近代国家的形成；而社会主义则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列宁的一党专制实践使得共产主义几乎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阅读各类政治刊物，从这些用语中就可以判断不少其立场。

赵京 二 00 八年八月十九日 美国圣拉蒙